



联合国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1995/41
11 May 199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995 年实务会议

1995 年 6 月 26 日至 7 月 28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 项目 7

经济、社会和有关领域的区域合作

《1993 - 1994 年欧洲经济概览》摘要

E/1995/100

95-14324

目 录

	<u>段 次</u>	<u>页次</u>
一、最近的发展和短期前景	1 - 30	3
A. 西欧和北美	1 - 14	3
B. 东欧和前苏联的转型经济国家	15 - 30	7
二、五年改革：简要回顾	31 - 68	11
A. 建设资本主义：中欧期望的起落	33 - 37	12
B. 幼稚的资本主义？	38 - 40	13
C. 转型的衰退：太深刻太漫长	41 - 46	14
D. 结构性失业	47 - 50	16
E. 持续的通货膨胀	51 - 54	17
F. 企业改革和私有化	55 - 59	18
G. 银行业改革	60 - 62	20
H. 外国投资	63 - 67	21
I. 结论	68	22
三、墨西哥危机和转型经济	69 - 75	23
四、转型战略重点的变化	76 - 85	26

一、最近的发展和短期前景

A. 西欧和北美

1. 美利坚合众国自 1992 年以来,西欧自 1993 年以来,经济正处于周期性的上升阶段,但只是到了 1994 年,产出增长才实际扩大到几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而且产出的平均水平最后达到了先前在 1990 年达到的周期性高峰的水平。虽然市场经济国家的活动去年已变得较为同步,但主要国家间仍有明显的差异:加拿大、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国现正接近于它们的周期性高峰,就像生产能力利用率的标准衡量尺度所表明的那样,而一些欧洲大陆国家,例如法国和意大利,似乎仍存在着大量的闲置生产能力。因此,西欧的增长率——1994 年平均为 2.5%——可望于 1995 年保持在 3%左右。在北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应从 1994 年刚过 4%下降到 3.5%左右。这样,就整个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而言,1995 年的平均增长率应当与 1994 年大体持平——即约 3%。

2. 在西欧和北美这两个地区,1994 年的增长实际上比一年前的预测要强劲得多。在西欧,产量平均增长 2.5%左右,而预测数为 1.5%左右;在美国,自 1992 年以来,产出的年增长率一直在上升,原来预期国内生产总值将上升约 3.5%,但实际增长了 4%。这样,进行预测的人好像仍然难以使他们的模型适应最近 10 年中世界经济所发生的结构变化。

3. 1994 年西欧经济情况好于预期的原因之一是,导致复苏的出口的增长势头出乎意料的强劲。西欧货物和服务的出口量上升了约 8.5%,但 1991 年或 1992 年早些时候将其货币贬值的国家达到的增长率普遍高得多。出口的初始刺激来自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根据仍不完整的统计数字来看,1994 年区域内部的需求继续强劲。来自外国需求的刺激促进了国内需求的改善,鉴于西欧各国的一体化程度非常之高,这种改善又进而导致欧洲内部贸易强有力的复苏。国内需

求的恢复当然导致了进口的增加,不过增长的幅度低于出口。因此,贸易的净增额使1994年西欧的增长率几乎提高了一个百分点。由于国内需求的增加,可以预计,对增长的这种刺激1995年将减弱。

4. 原来对1994年预测较低的另一原因是这样一种预期,即与以前的周期性上升相比,消费支出的恢复势头将会相对较弱,这不仅反映出西欧大多数国家的失业率继续居高不下,而且还有这样一种感觉,即就业保障要比以往差得多,特别是就中等收入组国家而言,它们到那时为止受失业的威胁较少。抑制消费的其他因素是,不少国家家庭负债的水平仍很高——80年代繁荣造成的后果——以及税收和行政费用也较高。因此,私人消费颇为呆滞,只提高了1.5%。其中大部分的增长不是来自实际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而是来自储蓄率的下降,这反映出当年的消费者信心提高了。国内需求也没有得到政府支出的很大支持,这种支出略有增加(平均增长率为0.9%),因为大多数政府谋求削减开支(特别是国防开支),而且普遍减少国营部门的赤字,对马斯特里赫特的趋同标准作了不同程度的承诺。

5. 西欧的一个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是投资气候的普遍好转。需求和利润增加,经营信心提高,同时生产能力的利用率也提高了。不过,人们有所担心,1994年长期利率的提高可能对投资产生消极影响,但是迄今为止这并不明显。至少就目前而言,投资意图更多地受实际收益率的明显提高和企业自有资金扩大的影响。与以前的收益率和金融资产的收益率相比,投资的实际收益率明显提高;而企业自有资金的扩大将为新的投资提供大部分的资金。虽然1994年固定投资的实际增长率只有1.5%,但整个这一年和1995年日益增加的势头有可能成为国内需求最活跃的部分,平均增长6.5%。

6. 1994年美国经济上升达到更深入的阶段,其特点是得到就业上升支持的私人消费(3.5%)和固定投资(12%)这两方面都呈强劲的增长势头。固定投资尤其集中于机械设备和新的住房。由于国防预算的减少,公共支出实际上下降了,而且进

口净额的增加也是一个越来越制约国内产出增长的因素。尽管如此,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4%)是1984年以来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

7. 随着产出的恢复,1994年西欧大部分国家的就业下降最后停止了,而且在第二、三两个季度,四个最大国家的就业数字小有增大。迄今为止,改善似乎主要在服务部门,但是就业仍处于从衰退中恢复过来的初步阶段,在这次衰退中,有550万人失去了工作。

8. 在北美,自1991年年底以来,美国新增的就业机会一直在稳步增加,而且1994年又有大幅度增加(3%)。就业的增加扩大到了制造业和建筑业,但是增加总量中五分之四在服务部门。后者增加的工作很大部分是非全日制工作或临时性工作;这是一个引起人们争议的问题,即这是反映出灵活的劳动力市场通融求职者的偏好呢,还是局内人歧视局外人造成的消极后果。移民劳动力,包括比例不小的非法移民,也有助于造成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9. 自1989年以来,西欧有近750万人失去了工作,而且1994年失业总人数几乎达到3000万。不过,在这一年中,失业率似乎已稳定了下来,而且失业水平在德国以及在部分较小的国家,特别是在联合王国,已开始下降。在联合王国,周期性上升走在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前面。

10. 公众对失业问题展开了大讨论,这些讨论强调必须取消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提高教育和训练水平,降低企业的非劳动力成本负担并采取其他供应学派的主动行动。所有这些建议都很确当和有益,但是如果总需求不足,受过教育的工人将照样找不到工作。欧洲经济委员会秘书处估计,在西欧,维持目前就业水平所需的最低年产出增长率是略低于2%。为了防止失业率的进一步上升,需要使这种增长率达到2.5%至3%;要使失业率明显下降,需将增长率维持在3%左右。

11. 欧洲经委会秘书处还估计西欧目前的潜在产出增长率为2%左右。目前,欧洲大陆有几个国家的空闲生产能力仍然相当可观,但是,随着预测的1995年实际

增长率将达到3%，这种萧条将会很快消失。到那时，实际增长将再次受到生产能力增长的限制。目前，这种增长显然不足以创造大幅度减少失业所需的就业机会。潜在产出和生产能力利用率的计算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误差，但是本概览提出的估计表明，大量减少失业人数的前景并不非常光明，除非大幅度增加固定投资。

12. 显而易见，只有当企业开始达到其现有设备的极限而且同时预计未来的需求将证明需要扩大生产能力时，它们才开始扩大生产能力。但是过去20年的一个遗产是，每当产出接近充分的生产能力，投资扩大生产能力的刺激就被通货膨胀重新抬头的担心所压倒；鉴于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它通常意味着提高利率，从而制约对以投资带头的增长的寻求。

13. 总的通货膨胀增长率现在低于数十年来的任何时候。在西欧，1994年的消费品价格的平均增长率略低于3%，并且没有在今年内加速的趋势。美国出现了类似的趋势，尽管它已进入了该周期深得多的阶段。由于产出的恢复和商品价格的急剧上扬，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发展。物价当然在生产能力充分利用时比在萧条时更有可能上涨；但是假定接近生产能力充分利用时将会再次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就是忽视自19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国家和整个世界经济所发生的结构变化。它也包括了一种可能性：过去几年不断下降的通货膨胀率将会降低工资生活者和制定价格人员的通货膨胀预期值。

14. 当前，西欧持续和平衡增长的经济前景也许好于自19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的任何时候。出口导致了复苏，而固定投资会使这种情况在1995年继续下去，同时私人消费也将增长，但是幅度不会太大。这样一种增长模式提供了最终促成失业率明显下降的真正机会。决策者们的艰巨任务是使这种机会不受汇率不稳定和金融市场操纵者对通货膨胀所持的悲观态度的影响。

B. 东欧和前苏联的转型经济国家

15. 1994年,东欧转型经济国家的经济情况明显好转,尽管这不像西欧那样反映出周期性的上升,而是从规模不亚于1930年代大萧条的结构或转型性产出大萧条中开始复苏。复苏于1992年在波兰开始,自那以来已扩大到了几乎所有的东欧国家。1994年,只有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的产出继续下降。¹其他各地都有增长,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的增长幅度很小(0.2%至0.8%),但波兰和斯洛文尼亚则高达5%。非官方的估计表明,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增幅甚至还要大,在这两个国家,产出自1990年以来曾大幅度下降。这样,自5年前转型过程开始以来,东欧各国总产出第一次增长了近4%。迹象表明,1994年下半年,大多数国家活动的步伐正在变得更加有力,而且似乎可以合理地预计,1995年的增长率将为4%。匈牙利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减速,也许会减到零增长,因为它提出了有关政策以对日益扩大的预算赤字和经济帐户赤字施加影响,而且罗马尼亚也可能这样,如果将宏观经济政策作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协定的一部分加以紧缩的话。但是在大多数其他东欧国家,1994年的增长率应能保持或提高。

16. 整个活动中的这些事态发展十分令人鼓舞,这对直接承受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巨大成本的那些国家来说尤其重要,但是需要从恰当的角度观察这些事态发展。在经过了几乎停滞的10年之后,东欧的产出于1989至1993年间平均下降了20%以上。如果维持1995年4%的预计增长率,仍将差不多要到本世纪末才再次达到1989年的活动水平。这当然不过是种算术而已,但它表明转型经济国家政府在试图解决依然不少的转型问题(在下文作更详细的讨论)和同时试图维持公众对整个进程的支持时面临的问题如此之大。人们对转型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很不满意,共产党后的政党在选举中普遍获胜就反映了这一点。政府不能无视这种高度不满情绪;西方和国际上提

供援助和帮助的国家可能有助于缓解部分社会不满的根源。如果牢固地确立未来的预期增长，公众的不满就可能很快消失，但据最近的一次民意测验，只有4个国家（阿尔巴尼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多数人民深信他们的情况正在改善。²另一方面，自1989年以来的整个时期，对转型经济国家的预测很不可靠：不仅大大低估了转型衰退，而且低估了去年的恢复。如果增长证明比预计的强劲，这将有助于加强经营预期和鼓励固定投资的起飞。

17. 若干国家固定投资的恢复实际上是过去两年最重要的事态发展之一。从整体看，固定投资总额1994年增长了5%左右，但是现代化计划正在进行之中的迹象可能反映在机械投资和主要改革国家集团投资的迅速增长中。在波兰，过去3年中机器设备方面的投资每年增长15%至17%；在斯洛文尼亚，1993和1994年增长11%至12%；而在捷克共和国，1992年增长了17%，1993和1994年也许会有类似的增长速度。在匈牙利，这种投资也在增长，但是增长率变化的程度大于其他3个国家。

18. 东欧国家投资的恢复需要在这里作两点评论。第一，恢复的资金主要来自企业本身，而不是由于国内储蓄的中介作用或外国投资者。企业自有资金的增长反过来又是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工资适当增长和产品价格大致适度提高的函数。这样，利润率的提高一直是想投资的企业的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从短期看，可将这一点视为金融机构仍不发达国家的一种强制储蓄的方式，但是，如果不对价格水平产生巨大的上涨压力，这种情况就不可能维持很久的时间。

19. 其次，目前投资活动的很大部分有可能集中于合理化和现代化上。这将导致新的私营企业创造工作机会，但可能不足以吸收农业和国有工业企业改组造成的失业人数的增加量和工作年龄人口的增加量。因此，目前的失业率在一段时间内不可能明显下降。

20. 实际上，尽管产出有所恢复，去年东欧的就业继续下降，虽然1992或1993

年开始恢复的那些国家的下降率有所节制。不过，在这一总数中，私营部门的就业迅速增长，特别是服务部门，但还不足以吸收国家部门失业的人员。

21. 因此，失业率仍然很高，1994年年底在10%至18%之间，其中捷克共和国是个明显的例外。整个东欧的失业水平似乎在1994年初达到高峰，总数约750万人，在该年的其余时间里，人数有所下降（约4%），可能反映出由于提前退休和所谓的劝退效应而使劳动力减少。由于失业的年轻人和长期失业者的人数都较多而且在上升，失业问题是转型经济国家政府目前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

22. 去年在宏观经济平衡的其他主要部分，即国内价格水平和国际收支方面，都取得了进展。

23. 在通货膨胀方面，1993年价格上涨最快的那些国家，其通货膨胀的速度明显放慢。在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1993年末和1994年初的稳定方案使通货膨胀率大幅度下降，尽管1994年最后一个季度南斯拉夫较低通货膨胀率的可持续性令人怀疑。另一方面，在主要的改革国家组内，现在证明，使通货膨胀率降到一位数内要困难得多。

24. 1994年，转型经济国家的外部状况普通有了明显改善。东欧的货物和服务的出口增加了18%（按美元值计算），差不多为进口增加速度的两倍，它是东欧累积经常帐户赤字大幅度减少的主要因素：从83亿美元降到34亿美元。除匈牙利以外的所有国家，情况都改善了，而匈牙利的巨额赤字继续增大。这种对外帐户，特别是出口增长方面的明确好转是1994年开始时所未料到的，它是增长比预测强劲得多的主要原因之一。

25. 波罗的海各国在稳定和改革其经济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要比前苏联的其他成员大得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去年的产出仍在下降，然而数量要比1993年小得多，而爱沙尼亚似乎已到了衰退的最低点（零增长）。三国在稳定经济方面取得了进展：1994年，政府赤字基本得到控制，而且通货膨胀率急剧下降。尽管如此，通货膨胀

仍居高不下(第4季度按年率折算为30%至近50%之间),而且经常帐户的收支转入赤字,这主要是因为进口迅速扩大。由于工业生产下降和企业改组,波罗的海各国的就业继续下降,但从产出暴跌的角度来看,失业率仍低得令人吃惊(2%至6%)。评估波罗的海各国的前景并非易事:由于其国民核算帐户不完整和需作大幅度修正,难以跟踪其经济的现状。预计这3个国家都将吸收相对较大数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而且与欧洲联盟签署联合协定的前景应当有助于推动它们向西欧的出口。因此,在外国投资的支持下,以出口为先导的增长的前景看来相当光明。

26. 与东欧形成了对照,俄罗斯联邦和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的其他成员的经济发展仍然颇不景气。在俄罗斯联邦,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继续下降,下降幅度为15%,下降幅度比年初预计的大得多。在多数其他独联体国家,产出削减的数量甚至更大,那些武装冲突正在破坏生产性资产的高加索和中亚共和国尤为如此。

27. 在产出继续下降的同时,许多独联体国家的通货膨胀急速加剧,在这些国家,普遍缺乏有效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在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虽然由于1993年末实行严格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通货膨胀率开头迅速下降,但这种情况未持续下去,到了秋季,通货膨胀再次开始加快步伐。

28. 尽管产出大幅度下降,俄罗斯联邦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失业率仍然非常低,虽然失业率现正在上升。1994年年底登记的失业人数为劳动力的0.3%至2.1%之间(亚美尼亚例外,它的失业率高得多)。俄罗斯联邦的官方估计数表明了这些数字的不现实性,它根据登记的失业给出了2.1%的失业率,但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定义给出了7.1%的失业率。尽管如此,独联体的低失业率并不只是一种统计上的人为现象:它尤其反映出宏观经济政策的状态和缺乏首尾一贯的改革方案,这种情况导致大型国有企业过多地雇佣大批人员(或称隐形失业)。

29. 与东欧相对照,俄罗斯联邦的经常帐户急剧恶化,1993年盈余,到1994年

变成了数额相同的赤字（近 30 亿美元）。贸易盈余几乎未变，因此，经常帐户的恶化主要是服务赤字大增（特别是旅游业，赤字增加了 26 亿美元）和支付给国外的利息净额。

30. 评估俄罗斯联邦的短期前景仍然极为困难。1995 年可能出现产出进一步下降，但数额较小。不过其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稳定政策，而不使它被农业和工业游说集团的要求所打乱。决策者们用了 3 年的时间试图稳定俄罗斯的经济但未能得手，现在他们还面临着一个信用问题需要克服。最近的货币基金协定能否使得力量对比有利于一套有效的稳定和改组政策，是重大的捉摸不定的因素之一。但是一俟有迹象表明政策朝着正确的方向摆动，就将出现精心协调的国际援助方案来支持改革努力。

二、五年改革：简要回顾

31. 回头看一下 1989 年以来东欧和前苏联走过的艰难的改革路程，对得失作出结论并不容易。很显然，在建立民主机构和将中央计划经济改革为市场体系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但转型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比预料的高得多。经济长期看跌，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保险大幅度紧缩，收入和财富差距日益拉大，保健水准下降及有组织的犯罪案件增多，这一切都造成沮丧、幻想破灭和日益加剧的政治紧张。因此，目前东欧人民的情绪与 1989 年早些时候柏林墙的倒塌引起的热情和希望已不可同日而语。在东欧国家政府中，只有一个国家例外，其他都掌握在直接扎根于往日共产党的政治势力的手中，这不啻是一种荒谬的讽刺。

32. 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也许是该地区最近政治和社会气氛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转型能否以较小的经济和社会福利代价实现，以及能否和应不应当利用不同的政策使这种代价降到最低限度，是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们激烈辩论的问题，而且这种辩论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尽管如此，人们几乎一致认为，

衰退比原先预计的深刻和长久得多,而且改革还没有兑现它许多明示和默示的诺言。

A. 建设资本主义：中欧期望的起落

33. 回忆一下 1989 - 1990 年中这些期望的内容可能给人以启发。从计划向市场和从极权的社会主义向民主转型的初期设想是什么?人们期望的改革结果是什么?在回答这些问题时,重要的是应记住民众的期望——主要受中央计划体制相对于西方经济制度的沉闷表现所左右——与政治精英们的期望之间存在的差距。

34. 起步的改革方案由稳定措施、机构改革和包括私有化在内的结构性政策等以不同的程度组合而成。货币和财政抑制的目的是降低通货膨胀率,恢复财政平衡和为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创造条件。对外部门的自由化将有助于确立纠正性的相对价格和使国内市场展开所希望程度的竞争。预期资源将从亏损的企业流向新的、有利可图的活动,这种活动将主要由新近成长起来的私人企业家从事和管理。社会福利的总体水平将会提高,即使也有一些失去利益的人,特别是在中央计划体制下享受特权的部分:重型工程、冶金、采矿和官僚机构。不过,预计调整的成本相对有限,其部分原因是会有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预计受劳动力成本低和处女市场的吸引,这些投资将流入经济转型的国家。

35. 没有人预计改革会很快完成;至少在大多数决策者看来很清楚,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体系将要花数年时间。但是人们也假定,至少部分效益将会很快实现,特别是消除短缺现象,以便于人们获得货物和服务,并使商业活动自由化。虽然大多数实施改革的政府没有确定确切的日期,但间接的证据表明,它们都预计经济将在较短的调整期后恢复增长,也许在一两年之内。³

36. 另一方面,老百姓的预期要不现实得多。对中央计划经济的低效和失败的大量批评似乎与西方国家富足市场产生的示范作用完全相吻合:其结果是人们普遍

认为,资本主义取代共产主义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且这种转变将使东欧各国人民长期低下的生活水准得到大幅度的迅速提高。

37. 现实证明比起从这种乐观的设想得来的预测要严酷得多。衰退和失业使这一地区的国家无一幸免,均遭到了非常沉重的打击。当预期的改善不能很快出现在眼前时,人们指责改革派政府无能、失策和腐败;常常援引耍阴谋的理论来解释没有取得成功的原因。许多人不可能理解与共产主义决裂竟会带来这样的痛苦。对改革的这种厌倦到处蔓延,表现为政府频繁更迭和政治支持转向反对派,有时候是转而支持平民主义的政党。

B. 幼稚的资本主义?

38. 不能否认,东欧各国自从5年前开始向资本主义过渡以来,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所有各国都建立了民主和多元化的政治制度,而且扭转走向市场经济的趋势的问题已几乎不存在。中央计划和国家管制的束缚已被铲除:物价已被放开,本国货币可以兑换,而且消费者和生产者基本上都可自由决定其偏好。通货膨胀率大幅度降低,长期匮乏的现象已被消除。大部分的产品由富有活力的私营部门生产,国内市场提供种类繁多的货物和服务,与西欧各国的情况并无二致。据官方的国家统计资料称,多数国家非国营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已超过50%,这表明自1989年以来走过的历程多么巨大,因为当时这一份额一般不到5%(波兰例外,因为农业多半私有化,这一比例为30%左右)。虽然要谨慎地对待这些统计数字——因为统计报告和部门分类的规则并非总是清楚和一致——但所有制结构的彻底变化则是明白无误的。

39. 转型国家的政府还在使其经济纳入全球市场经济方面取得了可观的进步:它们对外贸易的大头现在都按国际价格采用可兑换的货币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进行,而且由于外国直接投资和有关证券投资的流入,它们的国际联系得到了进一步的

加强，建立和发展了许多新的市场机构，例如股票交易所、货币和信用工具、反垄断条例、破产条例等等。到1994年年底，大多数东欧国家已度过了经济衰退的低点：长期等待着的复苏似乎就要到来。

40. 迄今为止取得的改革成果使人相信最近的断言，即转型国家已牢固打下了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基础。‘它们还表明，这些国家破除中央计划做法和按市场规则与惯例组织其经济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不过，尽管取得了所有这些成就，照样存在失误和失望的地方。事实上，经过5年之后，经济转型国家的资本主义仍处于创始阶段：增长迅速，但仍不成熟而且动荡不定。

C. 转型的衰退：太深刻太漫长

41. 1989年革命最令人不安和出乎意料的结果也许是所谓的转型衰退，它使产出和就业降到了远低于转型前的水平。官方的统计资料表明，转型国家1989至1993年之间产出的累积收缩是大规模的，是1929至1933年大萧条以来前所未有的。衰退特别严重的是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人们通常认为这两个东欧国家实行市场改革的准备最不足——以及前苏联的几乎所有的国家。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工业（总）产出的累积下降幅度较大，一般超过50%，下降幅度比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幅度大；到1993年年底，在最糟的国家中已超过了50%（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

42. 衰退方面令人感到意外的不是产出本身的下降——因为确实预料到会有某种程度的衰退——而是衰退竟如此深刻、如此普遍和如此持久，而且后来供应方面的调整如此无力。同实施稳定与改革并举方案一起出台的官方预测一般预计产出会出现暂时和较为平缓的收缩，接下来是效率提高引发的强有力的复苏，私营经营活动的扩大和外国投资的流入。⁵然而实际情况是，产出的动态是L型模式，而不是U型模式。

43. 衰退出于意外的深刻和持久,这仍是一个不解之谜。有人试图作出解释,多数集中于中央计划经济的结构和体制特点上。特别是有人论证说,根据新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以前生产的一大部分产品由于各种原因而变得不能持续了,⁶但与此同时必要的改组又固有地缓慢。⁷

44. 不过,产出的大幅度下降仍然令人迷惑不解,因为共产主义制度垮台的本身被认为会促成经济情况和生活水平大幅度的迅速提高,其原因恰恰就是传统的共产主义制度通常被认为非常浪费和低效。因此,管制制度的铲除和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被认为是一种提高效率和福利的社会经济创举。这样,下述情况就有点令人意外了,即多数专家现在倾向于认为经济转型国家产出记录的下降是一种相当自然和多半无法规避的现象。

45. 在最近几年中,有人提出了转型性衰退的若干可能的解释。其中,从凯恩斯的需求不足到熊彼特的体制解释,从作为苏式经济典型特色的结构僵化和扭曲到关于将衰退视为统计上的虚假做法的观点都有。其中没有一条是完全令人信服的,但是将它们合起来考虑就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46. 首先,应当指出,衰退是实在的而不是想象的:虽然看来不容置疑,官方的统计资料确实高估了产出实际下降的程度,但也可以论证:误差也许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小。⁸其次,衰退是需求和供给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联合结果;但是稳定方案对国内需求的不利影响看来是相当大的。借助于事后的认识,可以论证,稳定政策也许限制得太厉害,因为指导这种政策的是对开始阶段宏观经济不平衡程度的错误判断。第三,本来可以预计,摆脱共产主义将释放出大量的×效益,它们一般将有利于产出的扩大而不是收缩;⁹这些效益没有实现这一点着重说明了1989年盛行的关于转型国家供应方面响应性的过分乐观。如果采用一套不同的政策,微观供应的响应是否能够更加强有力,是一个尚待讨论的问题。

D. 结构性失业

47. 传统的比较经济学的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论点是,中央计划经济下出现的接近充分就业的程度是人为的,靠的是松弛的劳动纪律,思想上对充分就业的承诺和工资的低下。因此预测在转型期内将有大批人被解雇,但是也有人假定,日益扩大的服务部门和私营部门对劳动力迅速增长的需求将吸收工业的大部分过剩劳动力,因此失业率将是适度的。实际上,大多数东欧国家的失业率远高于劳动力的10%,而且居高不下,尽管产出正在恢复。

48. 劳动力市场统计资料的一个重要信息是,经济转型国家不仅失业率高,而且1989至1993年的过度就业的情况也只稍有减少(如国内生产总值累积变化与就业累积变化之差所表明的)。只有保加利亚和波兰的就业水平的下降幅度与产出的下降幅度大体持平,从而使初始的过度就业水平实际上没有发生变化;在所有其他国家,特别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过度就业的水平提高了,显然给劳动生产率和工资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49. 由于高失业率的主要原因是转型性衰退,原则上可以预计恢复将至少缓解这个问题。不幸的是,不能指望正在出现的恢复会根本改善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因为新创造的工作机会可能大体上被进入失业大军的新人所抵消,这些新人来自学校、人手过多的农业部门和日益萎缩的国营企业。因此,转型经济国家今后几年的失业率可能还得保持两位数。

50. 不过,长期的高失业率带来严重的危险。第一,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长期找不着工作,他们往往会因为丧失技能而被永远排斥在活跃的劳动力之外。这种滞后作用因而会在今后减少转型国家的潜在产出并增加它们花在广泛的社会安全网上的财政支出。在东欧,长期失业者(12个月以上找不到工作)在失业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在逐步提高,现在平均超过了40%,而且在诸如保加利亚和斯洛文尼亚等国已接近60%。另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失业者中年轻人和中学毕业生越来越多——

这种趋势具有这样一种高度危险：他们大都将长期找不到工作。这种情况的影响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不仅经济有可能因劳动力资源的浪费而损失，而且如果有太多的人失业时间过长，就可能危及社会和政治稳定。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不过旨在改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结构政策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包括训练和再训练方案，似乎是优先的行动领域。但是，如果要大幅度减少进入失业大军的人数，还必须恢复持续的、创造就业的产出增长率。

E. 持续的通货膨胀

51. 高通货膨胀率和普遍的匮乏是中央计划体制末日的特点。物价的放开和本国货币的初步贬值进一步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实际上，大多数国家的纠正性通货膨胀大大超出了稳定方案中设想的水平。因此，恢复基本的物价稳定是改革派政府的中心目标之一。经验证明，将通货膨胀从近乎恶性的程度压低到可加管理的水平是比较容易的，而且在一项可信和连贯的方案范围内采取财政限制的标准措施就能迅速做到。不过，已经成功地将通货膨胀年率降低到20%至40%的大多数东欧国家好象发现将它进一步降至一位数非常困难。

52. 所谓轻度通货膨胀的持续存在是不能轻而易举地用标准的理论来解释的。¹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似乎并不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因为它在所有东欧国家中普遍滞后于消费物价指数（唯捷克共和国除外，不过，那里的通货膨胀率是该地区最低的），而且在俄罗斯联邦和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其他成员国中甚至更是如此。此外，预算赤字的影响没有统一的模式：虽然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的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好象有着明显的联系，但东欧各国的迹象不那么明显（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通货膨胀率较低，但赤字却高于波兰或罗马尼亚）。整个地区的工资都受到管制，增长率一般低于消费品物价（例外情况再次包括该地区通货膨胀率最低的国家）。

53. 甚至在通货膨胀率被认为适度的地方，1994年也有幅度不等的变化，从捷

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的10%至13%到波兰的大约33%，而且这种增长率有可能对经济活动产生不利的影响。利率——名义的和实际的都在内——保持在高位上，因而妨碍经济的恢复；商业部门继续捉摸不定，而且投资的视野缩小了；由于通货膨胀对收入再分配的不尽人意的影响，可能会触发社会动乱。

54. 目前通货膨胀的性质似乎不同于转型初始阶段观察到的性质，当时自由化的冲击、过度的需求和财政赤字的货币化起着最重要的作用。轻度的通货膨胀似乎主要由惯性的机制，例如各种工资和养老金的指数化计划，频繁的汇率调整，主要商品的定期提价（大多是能源和食品）和通货膨胀的预期等造成。采用银根紧缩政策的标准手段制止这种通货膨胀的尝试往往是非常有效的，特别是在钉住汇率的情况下短期资本的流入推动国内货币供应时（就如在捷克共和国和波兰那样）。保守的货币政策仍然需要，但是它应当与通过打破惯性机制抑制通货膨胀预期的其他措施结合起来。

F. 企业改革和私有化

55. 转型经济国家的决策者们显然意识到了传统国营企业的制度性弱点，而且似乎已认识到，如果不进行改革，由于不仅管理人员，而且银行、工人和政府机构所面临的扭曲的鼓励结构，他们可能在市场环境中以反常的方式行事。在开始的阶段，这些危险先是通过严厉的以税收为基础的收入政策，过后再通过私有化而得以避免。然而大多数国家一揽子稳定方案的组成表明，这些方案是以这样一种内含的假设为基础的：国营企业对稳定措施的反应模式将大体上类似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见到的模式。这可能有助于解释国营企业和银行早期很少进行改革和私有化步伐缓慢的原因。实际上，国营企业非但不停止低效率的生产，辞掉多余的人员和以标准的、寻求最大利润的方式对市场信号作出响应，而是宁愿提高价格，保护就业和花大力气游说政府给予支持和帮助。

56. 收入政策虽然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的预期值,但它证明对于实施工资纪律和使失业率保持在低水平只是部分地有效;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只是阻碍改组,而且常被人们认为在社会上是不公平的,在政治上是无法接受的。另一方面,私有化证明比起初设想的要困难得多和耗时得多。

57. 从经济的角度看,私有化的作用是为企业引入高效率的公司管理方法和增加筹资来源;¹¹此外,在许多情况下它主要也被看成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基础。非常笼统地说,奉行了两种不同的私有化战略:一种以将国有资产无偿分配给全体公众的做法为基础;另一种则奉行逐个而定的商业方针。在第一种情况下,所有权的转让可以较快地推行,而且经济中非国有部门的份额的扩大“一举而成”。不过,后一种方法的主要优势基本上是它的速度。至于私有化的经济目标,要建立有效的公司管理所需的时间长得多,因为分配的计划造成分散的所有权,被动的所有人占主导地位。因此,虽然经理人员不再受政府的监督,但他们也未被置于新所有人的控制之下。有效的控制只能逐步实施,而不管分配形式上的所有权的速度有多快。捷克共和国的私有化结果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因为它的私有化被广泛认为是东欧最成功的。即使国家设法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放弃了其一半以上的工业资产,企业的行为实际上很少变化(如有的话),因为新的所有人或者很分散,或者虽然拥有具有战略意义的股份,但由于缺乏信息,利益相互冲突或普遍持消极态度等原因,而不能对经理们施加所期望的影响。这样,私有化了的企业已不是国有的了,但它们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完全私有化的企业。而且,采用这种私有化的方法,只向企业提供了有限的资金。俄罗斯联邦实行的凭单私有化,是国家迅速正式转让所有权的又一个例子,实行转让后,既得不到有效的管理,又得不到新的资本。

58. 根据第一个战略,当一个国营企业出售给新的所有人时,公司管理方法立即得到确立,追加的资金常常接踵而来,而且随之开始必要的调整;但是,由于这个战略是逐个推行的,使大部分国营企业有效地私有化要花很长的时间。因此,难办的

问题就是在一种广泛和肤浅的私有化与一种深刻和面窄的私有化之间进行抉择。不管选择哪种备选方案，经济改组的过程将花多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59. 可从过去5年的经验中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一种混合战略也许是可取的，它将无偿分配与商业销售的要素结合在一起。另一个教训是，在新近私有化企业中能够有效地建立公司管理的速度，应是确定私有化进程速度的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由于适当的管理不能在一夜之间实现，大批的企业将不得不在一段时间留在非私有制管理下经营。不过，为使可能的不当管理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可以采取几个步骤。第一，国营企业应当依法改造，以便建立可向管理人员提供的经济上可取的鼓励结构。可以通过公司化和商业化来做到这一点，这两种步骤将先行于私有化本身。其次，经理人员和董事会成员应当在其企业的未来市场价值中拥有份额（例如未来私有化时发行的股票的购卖选择权），以防止资产的浪费和失散。

G. 银行业改革

60. 只有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成为改革进程的一大障碍时，才会充分认识到全面改革转型国家的整个金融部门的必要性。金融部门的主要弱点包括缺少许多重要的金融中介机构（诸如养恤基金、互助基金、专门储蓄和贷款组织、证券公司、股票和债券市场等），现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基础小，银行过分依赖有限的客户（主要是大型国有企业），缺少信贷业务经验，以及审慎管理和银行监督不是没有就是不足。不过，决策者似乎并没有充分认识到，金融体制改革不仅是建立市场经济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本应在改革进程刚刚开始时就加以实施。

61. 转型开始时未能改革金融部门产生了一些重大影响。最重要的是商业银行的呆帐可能迅速积累，这是所有转型国家的一种常见现象。¹²一些呆帐是国有企业在中央计划体制时遗留下来的，当时它们的投资活动大多不受限制，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转型期内积累起来的那些呆帐。后者是因为企业和银行对宏观经济环境的突然改

变缺少适当调整而造成的。前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国家的经济长期衰退和传统出口市场的垮台也导致企业部门的许多技术破产和实际破产。

62. 呆帐问题现在是在所有转型国家中经济讨论的中心。任何有效且持久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必须将两类倡议结合在一起。第一,现有的呆帐积存必须通过全面的金融改革计划加以处理。第二,必须预先防止呆帐重新出现(流动问题),这意味着经济组织的行为方式有了根本改变,这种根本改变反过来又要求银行和企业管理人员可以采用的鼓励结构作彻底改变。

H. 外国投资

63. 从转型进程一开始,西方国家和东欧国家的政府就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在前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结构改革和转换中起着关键作用。围绕外国直接投资作用的初步乐观态度基本上是以觉察到的转型国家的许多特点为基础的:廉价的熟练劳动力充裕、地理上靠近西方市场、预料国内需求迅速增长以及商业立法放宽等等。

64. 转型5年后,结存似乎相当少。转型国家中外国直接投资的实际数额比预计的要低得多,另外,其在各个国家中的分配也极不平衡。此外,1994年外国直接投资额有所下降,主要是因为匈牙利投资下降了,自1990年以来,匈牙利曾经吸引了该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部分,但在大多数其他国家,外国直接投资却是疲软的。除1990年代初的一些大笔投资——诸如菲亚特在波兰的18亿美元投资、大众汽车公司购买捷克共和国斯科达汽车制造厂的股份,或通用电气公司买进匈牙利的通斯拉姆——以外,外国投资往往举棋不定,规模不大。

65. 这种结果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外国投资者在东欧国家找到了一些从其市场潜力、预期利润和涉及风险等角度看均为最好的公司,因而不急于向其他典型的债台高筑和人员超编的公司投资。但是,外国投资者不愿投资的一个更为普通的解释,可能与捉摸不定的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等更为普遍的和系统的因素有联系。在一些

国家,工会化程度较高和具有经常发生劳资纠纷的传统也可能是一个因素。早先的政府推迟、经常更改以及有时撤销关于私营化的决定,也给外国投资者传递了模糊不清的信号,从而造成了不稳定状况。¹³

66. 除了外国直接投资的有限流入外,它的分配有时也成问题。临时观察和专题研究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往往集中在具有相当大的谋求经济收益潜力的部门和分支机构,这种潜力可能来自准垄断地位,或来自与转型国家东道国政府达成的特殊安排。因而,东欧汽车制造业中的外国投资均以高关税税则的形式给予投资者特权为条件(例如在波兰)。大型多国公司为烟草产品建立对东欧市场的控制的企图背后也有类似的动机。¹⁴

67. 转型经济国家中外国直接投资的疲软和最近的下降并没有被官方援助所抵消。发展机构贷款资助的项目大体上相当于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投资类型,虽然前者的投资集中在基础设施和能源部门。这些机构给转型国家的有关项目支付1994年迅速增加,但不足以补偿外国直接投资的下降,尽管鉴于过去5年中积累了一些新的承诺,但进一步增加项目支付的前景似乎看好。

I. 结论

68. 1989-1990年,东欧国家热情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模式。但自那时以来,保留已经出现并已扩大,主要是因为没有料到转型的社会和经济成本这样大以及生活水平的改善这样缓慢。这些保留对决策者构成了重大挑战:它们要求采取富于想象力的国内政策,这些政策旨在使经济持续增长,遏制和扭转失业的上升趋势,加速进行必要的结构改革,同时保持金融纪律和宏观经济稳定。对政治领导人来说,目前的理想破灭情绪造成了采取民粹派措施的强大诱惑力,这可能带来灾难性的经济后果。最后,对市场改革的普遍保留也对国际社会构成了严重挑战,国际社会应把这种保留看作不仅是东欧人民不耐烦和天真的征兆,而且是真正的社会烦恼以及经

常是迷失方向的状况的反映，这要求与转型国家进行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合作并与其休戚与共。主要的政治和经济参与者回答这些挑战的方法将对今后几年转型国家市场改革的持续性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三、 墨西哥危机和转型经济

69. 当墨西哥比索在 1994 年 12 月 20 日突然贬值 15% 时，外国投资者的信心立即崩溃了，他们大规模地撤回了资本，从而导致汇率仅在几天内进一步下跌 18%。自那时以来，500 多亿美元的国际援助一揽子方案已经拟好，而且墨西哥政府已经宣布了可能导致 1995 年严重衰退的调整措施方案。这一危机的外部影响是复杂的，并且仍在缓慢地渗透进国际制度：不仅其他拉美国家因外国投资者失去信心而面临着严重问题，而且救助一揽子方案本身的性质也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美国的财政和经常项目赤字，从而使人们更加担心美国承受墨西哥极不稳定前景的风险。鉴于世界金融市场一体化的程度相当高，这种担心已导致 1995 年第一季度外汇市场的更加混乱。现在出现了一种风险，即如果德国马克的贸易加权值最近的升高不迅速扭转的话，西欧的经济增长将比最近为 1995 年预计的增长要低。

70. 不过，虽然西欧经济的较慢增长可能对转型国家持续出口增长的前景产生消极影响，但在墨西哥危机结束后迫在眉睫的担心是，这种前景是否容易受外国信心的同样崩溃和撤回资本的影响。在这一方面，评论家在金融报刊上经常提到匈牙利，而且匈牙利财政部长拉斯洛·贝克希在 1 月底辞职时表示了类似的担心。

71. 东欧转型国家的短期局势在许多关键方面与去年 12 月墨西哥的局势不同。首先，东欧易受外国资本突然撤回的损害是相当有限的，其简单的原因是 1989 年以来私人资本的流入不大，而且的确比预计的或希望的都要少得多。总的说来，1994 年前 5 年内流入东欧的私人资本总额大约为 420 亿美元，少于美国在墨西哥一国的私人投资，占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总额的一小部分。此外，东欧的短期贷

和证券投资的全部份额极小。匈牙利的情况也是如此，它成功地吸引了东欧私人投资的最大份额。

72. 在许多其他方面，东欧也不同于墨西哥。除匈牙利外，在过去的一年左右时间里经常项目状况有了普遍改善，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东欧国家为赤字筹资的有限能力。1994年，这些国家中有一半国家实际在经常项目上有盈余。去年外债水平（毛额和净额）已下降（匈牙利除外），在强劲增长的出口方面，债务负担相对说并不大。外币储备已大大增加，并且大多数国家现在已超过了拥有相当于3个月进口的外币储备这一传统的安全范围（匈牙利的储备目前相当于近5个月）。另外，大多数转型国家没有对固定汇率承担义务，因而避免了持续的货币定值过高，而货币定值过高是墨西哥局势的一个重要特点。还应指出，目前没有一个转型国家在资本帐户上采用可兑换性，它们都继续实行着资本控制，尽管有效程度不一。当然，这些措施有效地把当地的资本市场与全球资本市场分割开来。

73. 因此，目前似乎没有理由预计东欧会出现墨西哥类型的危机。短期外国资本突然和大规模撤回的可能性并不存在，不管怎样，去年12月前，预期环境在东欧已经起了变化：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兰的股票市场一年多来一直在下跌，少量外国证券投资在墨西哥危机前就已撤回本国；期望也不集中于固定的和定值过高的汇率——的确，匈牙利去年就8次将货币贬值，外国投资者不会对任何近似12月20日墨西哥货币贬值的事情感到意外。因此，对于东欧将受墨西哥危机的不良影响的担心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并且鉴于上面所说，这种说法首先是没有根据的。的确，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都能够在1995年初在国际资本市场筹集中期和长期资金，前者比1994年昂贵，而后者较1994年便宜。相比之下，许多拉美借款国根本就无法筹措新的资金。这并不是要断言，东欧完全不受墨西哥市场崩溃的所有余波的影响。在更加不稳定的全球环境中，外国投资者在向转型国家投资方面很可能更加谨慎，虽然这决不是确定无疑的。但外国投资去年已下降，这并不是因为墨西哥，而是因为一些国内

因素造成的，诸如转型国家私营化进程放慢以及对其他国家改革的承诺或其有效性难以捉摸等。

从墨西哥经验中吸取的教训

74. 虽然墨西哥危机不良的和系统的影响似乎被夸大了，但是就转型国家而言，还是可以从这一危机中为转型战略吸取重要的教训。一个教训是，过长时间依赖定值过高的汇率是有明显危险的。这能够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率，但它也鼓励消费品的进口，损害出口竞争力，并阻碍国内储蓄——与促成经济结构改革所需要的恰恰相反。这些缺点可以通过提高利率和吸引外国资本支持经常项目而暂时加以克服。这在90年代初是相当容易做到的，当时美国的利率降到了很低的水平，并且作为1980年代取消金融管制——它大大减少了流动资产的限制——的一个结果，利率的微小变动可以导致资本方面的大量投资。但到了贸易平衡恶化状况变得很严重的时候，比较小的事件就能引起信心的突然崩溃和资本的外流。

75. 人们对这种局势的传统反应是坚持认为，资本外流代表着对不切实际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市场裁决。当然这种看法有些真实性，但这种论点设想外国资本对经济基本因数作出反应，支持切合实际的政策和增长前景，并且避开不利情况。但证据表明，投机性妄想和浪潮影响在国际资本流动中起着重要作用。¹⁵在拉丁美洲，1990年代初，外国资本流入了几乎每个国家，而不管它们的财政、汇率或贸易政策如何，也不管它们是否存在严重的经济不平衡状况。¹⁶这种资本流动能够通过扩大汇率和利率的不稳定性，以及损害一个国家作为出口国和外国直接投资场所的竞争力，而使宏观经济管理严重复杂化。它们还会在短时间内产生经济取得成功的幻想，而这种幻想可能导致推迟进行鼓励长期投资和经济增长所需的改革。¹⁷（在墨西哥，消费和房地产投机激增，但固定投资几乎没有增加。）投机性妄想的破灭除了威胁金融制度的稳定——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外，还会经常使负债¹⁸家庭和企业负担大量费用，并

导致采取经济紧缩计划,这种计划会威胁社会稳定,尤其是政治和经济制度不很牢固国家的社会稳定。

四、 转型战略重点的变化

76. 正如上面所论证的,墨西哥危机对转型国家的不利影响是极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尚没有被很好地纳入世界资本市场。这样,它们的弱点便成为它们的主要弱点。完全纳入的障碍实际上反映了成为转型经济而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的条件;这些障碍包括缺少充分阐明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包括适当的法律和执法以及外汇管制体制),没有国际上接受的规章和会计制度,缺少足够的国家资金,以及现有股票和其他资本市场规模有限。国际信贷等级较差也反映了不完善的和未经试验的制度所产生的更为普遍的不稳定性,以及诸如大额财政赤字或较高的和时常变动的通货膨胀率等宏观经济持续不平衡问题所产生的不稳定性。

77. 显然,这些是需要正确处理的所有问题,但是给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劝告是,尽快消除或减少资本市场一体化障碍的影响,因为这种一体化连同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将通过降低资本费用、加强投资鼓励和提高国内资金筹措而促进发展。不过这一劝告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作为技术和规章变化的结果,国际金融市场提供了一个效率很高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投机行为可能给实际经济造成很大代价。私营部门的证券转移可能具有利率和汇率影响,这种影响也许会延长或甚至造成经常项目不平衡而不是仅为这种不平衡提供资金。²⁰投机活动造成的问题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很难处理的,并且可能是制度结构仍不完善和脆弱的转型国家更难对付的。因此,转型国家在完成转型、市场制度牢固建立和持续增长进程开始之前迈向与国际资本市场完全一体化似乎是不明智的。当作为改革进程的一部分,一体化的障碍被消除后,也许有必要加强控制,防止不稳定的资本流动。²¹

78. 外国短期资本大量流入像墨西哥这样的一些国家的公认危险之一是,这种

大量流入不仅会减少国内储蓄，而且会实际上变成代替为投资而筹措国内资金的努力，当外国投资者撤回资金时就会造成破坏性影响。不过，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不仅总是免受这种批评，而且已被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的政府认为在转型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外国直接投资将不仅有助于为经常项目筹资，而且将在采用新技术和新型管理和企业家文化方面起促进作用。实际上，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转型国家的数额大大少于转型开始时所预计的数额，并且主要集中在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对外国直接投资水平的失望不仅是因为不现实的期望造成的，²²而且是因为对外国投资的可能动机的误解造成的。主流看法认为外国直接投资总的说来是有利影响，它不管到哪里都传播新技术和管理方法，而且确保全球资金的更佳分配。就大多数经济理论而言，有理由支持这一观点。但是有一种替代看法，它与奥地利和熊彼特传统联系在一起，但根源至少可追溯到亚当·史密斯，这种看法认为企业行为是竞争性的，并且被谋求经济收益和统治市场的强烈欲望所驱使。²³正是在经济和社会制度相当薄弱——国家结构不牢固——的国家，这种更加损人利己的企业行为既更加明显又很少受到限制。根据定义，转型国家的特点是市场运行仍不完善，制度不成熟，以及至少可以说，对国家作用的态度不明确。这些都是鼓励外国企业寻求经济收益甚至控制国内政策的条件。有关市场结构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全面数据尚未得到，但是有许多趣闻证据表明，流入东欧的大部分外国投资旨在获得占支配地位的市场份额。²⁴这种情况连同保护国内市场使之不受其他外部控制的努力，可能与一些转型国家中被称之为民族主义和不理解市场经济活动的、对外国投资者与日俱增的敌视情绪有很大关系。在市场没有竞争力或国家缺乏有效控制力的地方，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设想，即外国公司的活动将自动有助于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或者增长格局将是当地人民所希望的一种格局。²⁵

79. 对把外国直接投资强调为在转型最初几个阶段具有主要作用是否合适或必要提出怀疑的一个原因是，东欧产出和投资的目前恢复率并不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具有关键意义。迄今，波兰接受了很少的外国直接投资——只有人均 43 美元，而匈

毛利为 688 美元，捷克共和国为 303 美元，但波兰的情况表明其产出恢复最为持久，对机械和设备投资大量增加。1993 年底对 200 家波兰企业的抽样调查显示，它们的股本近三分之二已超过了 10 年，因此竞争的余地是相当大的。实际上，被抽样的公司的 61% 以上自 1991 年以来已采用了新技术，大部分新技术是从经合组织来源借贷两讫地购进的，而不是通过合资企业或外部投资者获得的。按外国设计或用外国生产技术生产的全部产出的比例占整个抽样的 30%，占私营公司的 58%。²⁶

80. 波兰经验表明，并非外国直接投资对调整和重新开始增长必定是无效或不加于的，而是它不是使转型进程开始的必要条件。外国直接投资不是获得新技术的唯一传送带，因此不应阻止转型国政府更认真地评估外国投资过早流入的代价。此外，把外国投资看成是成功地进入市场经济国家大家庭的试金石的倾向可能使人产生误解，如果外国投资被用来作为国内资源调动的一种替代而不是一种补充的话。在墨西哥，短期资本流动被用来支持消费而不是支持固定投资；但是在没有国内资源调动的情况下，外国直接投资可能或者证明是脆弱的，如果外国投资者认为他们是主要股本处于危险之中的唯一投资者的话，或者引起社会和政治问题，如果它在东道国经济中起过大的支配作用的话。²⁷实际上，如前所述，将主导作用给予外国直接投资的战略并非十分成功，而且竟然产生了许多失望和一些怨恨。

81. 因此，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是，尤其在经济现代化的初始阶段和在重新开始持续增长进程中，执行更加名副其实的自力更生战略。这将需要 (a) 扩大国内储蓄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 (b) 如果对外国投资的依赖或使经常项目赤字均保持低水平或加以避免，那么国民产出中出口份额的增长应超过进口份额的增长。除建立合理的宏观经济稳定度外，在特别保持对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的控制方面，这一战略表明，对金融部门的改革应当给予最优先考虑，以便动员和保护国内储蓄，²⁸并应优先考虑促进具有广泛基础的出口。²⁹

结构改革的必要性

82. 尽管在市场改革的历史和进展速度与目前宏观经济成就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东欧的转型国家显示出许多相同之处。它们中的大多数在稳定经济、巩固国内货币以及发展强大而又充满生机的私营部门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它们还设法将其贸易从萧条的东方市场转向更有竞争力的西欧市场。但是,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东欧国家仍面临着一些共同问题,如果不以适当方法加以解决,这些问题可能会妨碍经济恢复,甚至导致该地区的政治不稳定。尤其是它们都面临着基本上相同的大规模重建其生产能力的任务,这一任务包括资源的大规模重新分配,以及可能关闭许多低效率企业。在这一方面,结构改革的缓慢步伐引起了严重的忧虑。国有企业改造的政治障碍、新投资和现有工厂的复兴缺少资金,以及资源大规模重新分配所涉及的困难凑在一起阻碍了改革,并促成了高利率和通货膨胀。结构改革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实际的和预计的影响,也是大多数转型经济国家中激烈的政治暗斗的一个原因,这种暗斗则成为延缓改革进程的一个因素。改进低效率的和不发达的金融部门的工作也在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呆帐负担对商业银行为企业部门提供资金的能力也有消极影响。公共财政的改革尚未完成,社会保险预算支出的迅速增加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破坏国家预算的脆弱的稳定性。在所有国家中,国内公共债务一直在不断增加,在其中的一些国家,国内公债也许很快达到惊人的比例。

83. 正如上文所论证的那样,东欧转型国家的经济成就也将严重依赖出口的继续扩大,如果对外国资本的过分依赖要加以避免的话,或者因为这种资本似乎不可能大量获取,如果国际收支不成为对增长的一个制约因素的话。鉴于必须进口新技术来支持结构改革进程,因而扩大进口能力将主要依靠出口增长。1994年产出的恢复主要是因为向西方市场扩大出口而推动的;不过可以预计,西方进口需求的周期性上升在1995年将会稳定,而1996年期间将逐步疲软;除非国内增长来源出现,否则转型经济国家中目前的增长率可能会大大放慢。不过,出口对增长的积极影响也许会扩大

和加强,如果把更好地进入西欧市场的机会给予转型国家的话,而这反过来可能会鼓励可在较长时间内在扩大出口方面起有益作用的外向型外国直接投资。但是,出口增长也可以由不仅针对西欧而且针对亚洲和发展中世界其他地区更活跃的国家促进出口努力来支持。这反过来将要求按照上面援引的促进贸易方案中讨论的方针,改善转型经济国家的贸易基础结构。

84. 1995年及其以后所有转型国家可能越来越多地遇到有关增长的另一个主要制约因素是相当低的国内储蓄率,这将限制国内资助投资的潜力。这些国家目前人的收入的低水平只是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在转型前时期积累起来的家庭储蓄的相当大一部分因通货膨胀和汇率变动而荡然无存)。转型国家迫切需要制定鼓励更多储蓄的政策。在这一方面,银行存款的正数实际利率是重要的,但还不是足够的刺激因素。需要发展各种有吸引力的和安全的储蓄手段,诸如互助基金、养老基金、债券和普通股票。还有,可以通过金融证券的发展来提高获得更昂贵货物(耐用消费品、住房)的机会,让人民把收入的较大比例储蓄起来,以便为长期购买和投资提供资金(抵押、消费信贷等)。

85. 经济前景也将取决于转型经济国家的政治发展情况。在这一方面,一个重要问题是,转型头几年占主导地位的对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的政治支持在过去两年中的几乎普遍转移,是否对经济改革的方向和速度具有影响。1993年在立陶宛和波兰开始出现了政治权力转移给社会民主左翼的现象,随后1994年在匈牙利、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1995年初在爱沙尼亚也发生了类似的政治变动。对这些政治变动后市场改革的持续性的直接忧虑和怀疑迄今已证明是毫无根据的。虽然大多数新政府对迅速的或自发的私有化表现出不那么热情——并且的确在一些国家,所有权转让的速度放慢了——但是对它们有关继续推动市场转换和民主改革进程的承诺似乎没有什么怀疑。不过重要的是要强调这些政府面临的问题。改革5年后,在改革经济和政治制度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并且在许多国家中产出恢复的头儿

个迹象已经出现。东欧许多人从这一进程中得益匪浅，尤其是受过教育的青年、有技能的人和有企业家魄力的人。但是也有许多损失者，尤其是老人、无技能的人、国家雇用的和许多有职业的人。没有一个东欧政府能够忽视他们日益增大的不满情绪这一因素，并且如果他们的人数继续增加的话，那么社会稳定和继续改革的承诺都可能受到破坏。外国投资者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兴趣可能不如对这些问题是否将造成投资风险的兴趣大。但这正是来自西方政府和国际机构的更慷慨和目标更明确的官方援助额可以在帮助转型国家政府减少调整的某些社会成本，同时使改革不下轨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西方政府经常声称，它们负担不起这种援助，但这种声称是从政治意愿和长远自身利益的计算问题中抽象出来的。东欧和前苏联的转型进程的停顿或失败的代价可能比预先支持这一进程的代价要大得多。

注

1. 无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数据。

2. 见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中东欧晴雨计》（布鲁塞尔，1995年3月）。

3. 需要对早期稳定方案的目标和结果进行比较，见欧洲经济委员会，《1991-1992年欧洲经济概览》（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E.92.II.E.1）。也见D.M.Nuti和R.Portes，“中欧：前进的道路”，载于R.Portes所编《中欧的经济改革：进度报告》（伦敦，CEPR-EUROP，1993年），第1-20页。

4. 见“卡姆苏斯讨论中东欧经济转型国家的进展”，《货币基金组织调查》，1995年1月23日，第21页。

5. 1990年，波兰政府假定，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幅度将被限制在3%至5%之间，随后将于1990年下半年恢复。即使在1991年初，即当波兰经济处于螺旋形下降趋势时，政府仍在预测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3.5%。实际上，经济又收缩了7%。其他国家也犯了同样的低估错误。匈牙利政府预测1991至1993年每年增长2%至3%，但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分别下降了12%、5%和2%。在捷克斯洛伐克于1991年改革开始时，政府谨慎地估计产出可能下降5%至10%；实际的结果是仅在1991年就下降了14%，接着1992年又下降了7%。在保加利亚实行稳定和改革的头两年（1991-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7%，比初期的预测11%大得多。见欧洲经济委员会，《1991-1992年欧洲经济概览》（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E.92.II.E.2）。

6. 例如见P.Hare和G.H.Hughes，“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的竞争与工业投资”，CEPR讨论文件集，第543号（伦敦，1991年）；I.Sujan，“论产出下降的不可避免性”，载于J.Pöschl编，《捷克经济学家论改革》，维也纳比较经济研究所，第206号研究报告（1994年5月）；J.Winiecki，“向市场转型初期产出下降的不可避

免性：理论基础”，《苏联问题研究》，第43卷，第4期（1991年）；第676-699页。

⁷ 例如见 B. Chadha、F. Coricelli 和 K. Krajnyak，“转型经济国家的经济改革、失业与增长”，载于《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文件》，第40卷，第4期（1993年12月）。在这方面，J. Kornai 创造了“改革衰退”一词，使它同与正常的西方式商业周期相联系的定期衰退具有根本的区别。见 J. Kornai，《改革衰退：通过匈牙利发展实例研究的普遍现象》，Collegium Budapest，高级研究所，讨论文件第1号（1993年6月）。许多其他的作者也表示了类似的观点〔例如见 O. Blanchard、R. Dornbusch、P. Krugman、R. Layard 和 L. Summers，《东欧的改革》（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1年）〕。

⁸ D. K. Rosati，“从计划向市场转型期间的产出下降：重新考虑”，《转型经济学》，第2卷，第4期（1994年），第419-441页。

⁹ 在最一般性的术语中，X 效益的概念指实际与最大产出之间差距的弥合，即更好地利用为一定产出所作的投入、个人不同程度的工作努力和纪律、代理人-委托人关系中不同程度相对立的利益、惰性成本和某些其他因素而产生的收益。要了解 X 效益概念的更详细的说明，见 H. Leibenstein，《一般 X 效益理论与经济发展》（纽约和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17-38页。

¹⁰ R. Dornbusch 和 S. Fisher，“轻度通货膨胀”，《世界银行经济评论》，第7期（1993年），第1-44页。

¹¹ P. Aghion 和 N. Stern 编，“转型中企业改组的障碍”，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工作文件，第16号（伦敦，1994年12月）。

¹² 呆帐包括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不能履行的资产，大多数以提供给企业而企业因各种原因无法或不愿偿还的过期信贷的形式出现。

¹³ 俄罗斯联邦政府最近作出的对已经私营化的企业恢复部分国家控制的决定，或匈牙利政府向美国财团出售一家国营大旅馆的报盘的撤回提供了对外国投资者采

取“收放”政策的例子。

对允许外国公司在卷烟业中采用广告和分配法的福利影响似乎很少或没有进行讨论。在东欧和前苏联，与吸烟有关的疾病所造成的男子死亡率是世界上最高的，而女子死亡率属最低之列。见 R. 皮托和其他人，《发达世界吸烟造成的死亡率，1950年-2000年》（纽约和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A. R. 高希，“主要工业化国家中的国际资本流动性：太小还是太大？”，《经济季刊》，第 105 卷，第 428 期（1995 年 1 月），第 107-128 页。

贸发会议，《1993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93. II. D. 10）。

墨西哥的成功幻想几乎没有受到外国政府、国际金融机构或私人银行和证券公司的怀疑。见 H. 考夫曼，“为什么警钟不在墨西哥上空敲响”，《欧洲华尔街日报》，1995 年 1 月 27-28 日。但根据理智的诚实和职业道德规范竟然应当承认，贸发会议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的文章正文发出了明确的和一再的警告。警告，并且在预防性注释中没有隐瞒关于拉丁美洲国家因如此严重依赖短期资本流动来为它们的经常项目赤字提供资金所遇到的危险。贸发会议，《1991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第 95-97 页；《1993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第 113-125 页；《1994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第 95-115 页（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91. II. D. 15，E. 93. II. D. 10，E. 94. II. D. 26）。

S. 克莱森斯，“发展中国家里股本投资的出现：概述”，《世界银行经济评论》，第 9 卷，第 1 期（1995 年 1 月），第 1-17 页。

B. Eichengreen、J. Tobin 和 C. Wyplosz，“国际金融车轮上的沙子的两个例子”，《经济季刊》，第 105 卷，第 428 期（1995 年 1 月），第 162-172 页。

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资本流动、汇率确定和持久性经常项目差额》（巴塞尔，1990 年）。

²¹ 至于资本控制和管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成员国利用资本控制的国际制度的广泛调查，见贸发会议，《1994年贸易和发展报告》，第95-115页。关于遏制投机性流动的建议，也见Eichengreen、Tobin和Wyplosz，已引用的段落；至于表示怀疑的反应，见同一期《经济季刊》刊载的P.加伯和M.P.泰勒的文章以及P.B.凯南的文章。

²² 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济公报》，第46卷（1994年），第4-5页。

²³ 关于这些问题的详尽讨论，见R.Kozul-Wright，“跨国公司和单一民族独立国家”，载于J.Michile和J.Gireve-Smith所编《管理全球经济》（纽约和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35-171页。

²⁴ 欧洲经济委员会，《1993-1994年欧洲经济概览》（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E.94.II.E.1），第5章。

²⁵ 欧洲经济委员会，《1989-1990年欧洲经济概览》（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E.90.II.E.1）。

²⁶ M. Belka、S. Estrin、M. E. Shaffer和I. J. Singh：“波兰的企业调整：来自对200个私人、私有化和国营企业调查的证据”，CEPR工作文件，第658号，（伦敦，1994年9月）。

²⁷ 外国直接投资一般被看成是外国投资流量的一个更稳定的部分。有理由相信，许多情况下是如此，但是外国直接投资是在相当短的时间范围内进行的，有一些证据表明不同类型的外国投资的相对稳定性差异很小。见S. 克莱森斯、M. P. 杜利和A. 沃纳，“证券资本流动：热还是冷？”，《世界银行经济评论》，第9卷，第1期（1995年1月），第153-174页。

²⁸ 至于对金融改革的战略重要性的讨论，见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济公报》，第46卷（1994年）。

²⁹ 至于这样一个区域基础上的计划的概要，见“促进转型经济国家贸易发展的方

E/1995/41

Chinese

Page 36

式方法”，第 I - III 部分，(E/ECE/1311, 1995 年 2 月 17 日)，在欧洲经济委员会第 50 次会议上递交的报告。